

解放后韩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殖民统治认识和关系史构成的变化

金 泰雄（首尔大学）

原文为韩语，翻译：金 丹实

1. 序言
2. 去殖民话语的出现和历史叙事的重构：1945年至1948年
3. “中共”话语与二分论架构的出现：1949年至1964年
4. 韩日关系的新探索和韩国史体系化的问题：1965年至1981年
5. 韩日历史冲突和民主化运动的联动：1982年至2001年
6. 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路程和《东亚史》的诞生：2002年至今
7. 结语

1. 序言

自从解放以来，韩日关系一直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韩国社会经历了去殖民化和冷战秩序，在此过程中由于国家分裂与战争、工业化、民主化以及南北关系起伏等原因，发生了有别于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也可能是预料之中的事。因为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潜伏在韩日关系背后的历史阴影，随着韩日两国学者不断挖掘并整理出新史料，正式进入民众的视野。

两国关系的这种大起大落，反过来影响了本国历史叙述的架构及韩国史/东亚史历史教育。究其原因是因为每个时代对去殖民化的诠释和执政阶层的视角、知识界对韩日关系的认知等，与当时面临的国内外现实问题紧扣在一起，未能够保持其一贯性。尤其是韩国的政治圈和日本完全一个样，没有将这个问题交给学术界和教育界进行长期持续的探讨，而是选择了直接干预，导致教育现场时不时陷入混乱。

这篇发言聚焦于韩国政局的变动与去殖民问题环环相扣之下历史叙事所呈现的变化，梳理了叙事重构的轨迹及其涵义。尤其是将重点放在了历史教科书和支撑它的教育课程的变化上。因为这些历史教科书隐含着历史叙事的构架，并且以最为具体的方式在日常中体现了出来。

2. 去殖民话语和历史叙事的重构：1945年至1948年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从日帝统治获得解放，终于可以建设新国家、重建本国文化、重塑本国历史。换句话说，所谓的去殖民化成为了可能。大多数知识分子为建设新国家积极投身学术和教育运动。这时清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历史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完成去殖民的历史叙事重构，同时也是为走向未来奠定基石¹。正因如此，历史叙事势必聚焦民族的苦难及清算被侵略历史的问题，构想单一民族国家，展望被压迫民族携手并肩的合乎伦理的亚洲。² 然而历史叙事和基于虚构与想象的文学不同，终究还是把重点放在基于事实的叙述上。

历史叙事的这种建构和再生产，最先并非是从学界，而是在教育界付诸实行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新国家建构中文化的建构和集体记忆的重建必须是国民教育先行，学术方面的成果次之。因而将此前隶属于日语及日本史的韩语及韩国史从前者中剥离独立，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朝鲜语学会和震旦学会分别在1945年12月和1946年5月出版了《初等国语教本》和《中等国史教本》。正如后者的范例所示：“力求简明扼要地叙述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国家社会变迁发展的概况”。并且将“学习国史的意义”规定为：“深入了解我们的民族和文化的传统及发展，理解民族性的本质，涵养健全的国民精神、国民道德及情操”。换句话说，历史教科书的内在叙事，与民族国家构建这一时代命题是密切相关的。

1 历史叙事与文学及神话不同，第一手事件是实际事件而非虚构。只是历史叙事采用了文学发明出的情节结构类型，给某种文化进行过整合的过去事件赋予形态，将其转换成二手意义类型。关于这一点请参考Donald E. Polkinghorne, 康贤锡等翻译,《叙述,与人文科学相遇》,学林社,2009年,第137-138页;梁浩焕,《历史教育的立论与构想》,与书同行,2012年,第193-207页。

2 河申爱Ha Shin-ae,《解放时期历史叙述中的脱/殖民性和新生亚洲的想象——以金东仁为中心》,《东亚文化研究》第81期,2020年。

与以往的日本史教科书相比较，如表1所示：

表格1:《国史教本》（1946年）和《中等历史》（1944年）对比	
国史教本	中等历史2(1944)
第一部分 上古（太古、三国时代）	第一部分 太古（从天照大神到大化革新）
第二部分 中古（新罗统一～高丽时期）	第二部分 古代（从大化革新到平安时代）
第三部分 近世（李氏朝鲜）	第三部分 中世（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以前）
第四部分 近现代（国纪4243-4278年，公元1910-1945年）	第四部分 近世（从江户幕府到明治维新前）
	第五部分 现代（从明治维新到退出国际联盟）

虽说将叙述主体改为韩国人的历史，但是从时代划分和内容结构来看，《国史教本》与《中等历史》基本是大同小异。这是韩国史研究还没有走上正规的情况下套用日本史框架的结果。

与此相反，囊括东西洋史的1944年版《中等历史1》的构成如表2所示：

表2 《中等历史2》（1944）	
序言：皇国、东亚及世界	
<p>前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古代的亚洲 2. 亚洲各民族的互动 3. 亚洲各文化的兴起 4. 亚洲各民族的活跃 5. 近代的东亚 	<p>后篇</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上古的欧洲 2. 欧洲社会的形成 3. 欧洲的转变 4. 近世各国的发展 5. 欧洲的创新 6. 欧洲的世界政策

而在课堂教这类东/西洋史时，始终是以日本史作为参照系的。

《中等历史1》的序言“皇国、东亚和世界”就学习目标和方向阐述如下：

“东亚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前一部分，首先学习皇国以外的大东亚历史，在后一部分主要学习欧美的历史。当我们以这两者的密切关联作为核心展开学习时，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世界中东亚的过去与现在，皇国进展的背景也自会更加鲜明。皇国国民在学习东亚及世界的历史时，时刻不要忘记这一学习目的。³

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洋史课程的教学目地在于让学生明白“皇国进展”，亦即“大东亚战争”的背景及其正当性。此处所说“皇国”也包括朝鲜。

历史教科书的这种三分论（将历史分为东洋史、西洋史和本国史这三部分的划分法。译者注），到解放后仍被继承了下来。金庠基、金一出和金圣七在教授要目时期（执行美军政制定教育课程的时期。译者注）以前的紧急措施时期（根据新宪法由总统下达紧急措施进行管理的时期。译者注）编撰的《新东洋史》（1948）很好地反映了东亚史的这种架构。关于叙事构成，该书前言记述如下：

国史中有关的事实，我们尽可能从相互关系着眼详加叙述，力求揭示国史与东洋史之间的关联

然而，这里所说的东洋史中，不包括日本史。对东洋史的定义和范围，编者规定如下：

所谓东洋史，是指以我们的邻国中国为中心，揭示政治上、文化上密切相关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兴衰的学问（国史的史实仅限与邻国有关联的部分将其收入）

另外，东洋史的地理范围随着时代演进有所扩大，很难一概而论。但大体上以印度至中亚东南部的轴线为基准，此线以东大陆地区和太平洋上的多个零散岛国包括在此范围内。⁴

从下面例子可以看出：名为东洋史教科书，内容却清一色都是中国史。之后在近代部分叙述了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印度和越南的独立运动。而关于日本，仅在“美国与日本”、“清日战争”和“日俄战争”部分有简略的叙述。而且，提及明朝末期的北虏倭乱，在“东洋倭乱”为题目的单元，将倭寇和丰臣秀吉描述为让东亚三国不宁的祸患。可见此书与其说是涵盖日本前近代部分的通史，不如说是聚焦日本的侵略，从韩日关系史层面进行叙述。解放后韩国面临去殖民挑战，时值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前夕，历史学界打破日本把自己塑为东洋和平守护者的架构，将日本描述为破坏东方和平的罪魁，显示了历史叙事的逆转。与此相反，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后不久的同年10月，崔南善所著《中等国史》、《朝鲜本位中等东洋史》等书

³ 文部省，《中等历史1》，中等学校教科书株式会社，昭和19年(1944)8月13日，4~9页。

⁴ 金庠基，金一出，金圣七，《新东洋史》，同志社，1948年，第1页。

籍与李光洙的《文章读本》一齐被教育部勒令禁止使用。⁵

当时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意识。⁶ 比如，1949年出版的《邻邦的生活：历史》一书中，中国明显被相对化了⁷。但相比之下，去殖民的问题迫在眉睫，因此无法增加日本史的权重。

以中学为例，一年级开设《邻邦（东洋史）》，二年级开设《远邦（西洋史）》，三年级开设《我们的国家（国史）》。而在这些课程中，日本史被彻底排除在外。崔南善著《邻国的历史》几乎就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如果说解放前夕的东洋史以日本为中心，而现在则转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换句话说，从基于日本中心的位阶序列型连带论的东洋史，变成了基于中国中心的位阶序列型文化论的东洋史⁸。东洋史进而被列为高等公务员考试和大学预考笔试科目中的选修科目，与西洋史一道被选入考试科目⁹。

可见既继承了1945年8月以前日本殖民时期将历史划分为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部分的课程体系¹⁰，同时又从日本占据主流的以往历史叙事中剔除掉日本，配置韩国史内容来替代它，并且从被侵略国的角度重构东洋和平话语。这样的叙事架构是无意识地继承了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出的一国中心历史叙事为基轴的三分论的结果。

3. “中共”话语和二分论架构的出现：1949年至1964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事件对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堪比日本帝国主义的覆亡。这为日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韩国（朝鲜）战争”埋下了伏笔。毋庸置疑，冷战格局的出现和对立加深，对这场战争的生成起了作用。然而，朝鲜半岛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左右翼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国共内战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对这场战争的影响，要比冷战秩序的固化大得多。李承晚政府公然称中国为阻碍韩国实现北进统一的“中共傀儡”。这就是基于反共主义和北进统一论的“中共”话语。

从此，韩国政府的执政层有意识地对中共坚持两种态度：其一是对当下占领大陆的“中共”，立足于反共主义，将其与传统中国区分开；其二是视台湾为反共堡垒，与之携手将台湾与传统中国联系起来。历史叙事的重构体现为对空间和时间的这种割裂。于是现实中的中国大陆，以被抽离历史的形态进入到由台湾代

⁵ 《文教部在全国中等学校校长会议下令禁止使用亲日派教科书等》，《朝鲜日报》1948年10月12日。
：《教科书与风纪取缔等学制最后决定》，《朝鲜日报》1948年10月12日。

⁶ 孙晋泰·李海南，《邻邦的生活（历史部分）》，探求堂，1952年，序言。与此相关的是柳永泰，《韩国的东亚史认识与构成：通过东洋史研究60年看东亚史》，《历史教育》107，2008年，第140~143页。

⁷ 柳用泰的上面论文 第142~143页。

⁸ 关于战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东洋叙事，参考尹相鉉的《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论述研究》，首尔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6~40页。

⁹ 《考试委员会制定国家高等高考实施规定》，《东亚日报》，1948年10月11日

¹⁰ 大韩帝国时期，政府以本国史和万国史的二分主义构建历史叙述。

表中国的东洋史空间。

另一方面，1950年代开始强调应为“人类文化”做贡献、“克服后进性”，于是自由主义系列知识分子一跃占据主流。他们认为西方过去曾是文明史上的领头羊，现在是自由建设的中心，落后的东洋向西方学习便能克服后进性，并实现自由主义¹¹。社会学家李相侑甚至主张：“西化即现代化”。在上述关于东洋的言说中，唯有日本还算勉强被视为摆脱了后进性的国家¹²。从这些主张推演出的就是亚洲的停滞性。经济学家裴成龙受到比特福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影响，甚至将“中共”和苏联定义为“东方式专制政体”。历史学家金龙德认为，韩国也和中国一样，国家权力的这种特性导致公民阶层发育受阻，陷入停滞之中¹³。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经济学家也逐渐接纳亚洲式生产方式这种说法¹⁴。于是，关于东方停滞性的言说，并没有朝着去殖民话语的方向更新迭代，而是沦为力主南韩改造必要性（落后性）的某种修辞手段。当然，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也曾出现一股潮流，一些学者将传统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挂上钩，主张应重视其内在的力量¹⁵。他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而不是现代化的失败。在这一脉络上也重视起日本史的内在发展¹⁶。然而，由于东方专制论与东洋落后论的结合影响广泛，这股潜流根本不足以形成气候。尤其是在自由党政权内部，随着极权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团体一族青（朝鲜民族青年团）势力被清除，话语权转移到持欧洲中心史观的自由主义政客的手中¹⁷。这种政局的变化导致西方中心的历史叙事占据主流，去殖民议题的重点也落在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之上，而不是民族问题的解决。

关于东洋的这些负面话语，包含历史叙事自身的矛盾，因而在1955年课改时，东洋史最终没能作为独立科目在初中课程中存续下来。我们也无可否认，合并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综合地学习世界史获得更广的历史视野，由此客观深入地了解本国历史¹⁸。然而，对东洋史即中国史的偏见在此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历史脉络有所不同，不妨看作这是回归到大韩帝国时期二分论（把历史分为本国史和世界史两大块的方法。译者注）的架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就这样被纳入《世界史》。由于东洋史被编入世界史，西方中心的观点被进一步强化¹⁹。当然，在日本统治时期，西方中心的观念也一直是主流。但与之并存的还有以日本为中心的东洋史，这多少能牵制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东洋史失去了独立性，势必会出现西方中心叙事构架垄断历史话语的局面。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了教科书分量比例上：东洋史的篇幅仅占30%，而西方史则超过了70%。这种极端不平衡也违背了综合理解世界历史、坚持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这一教学宗旨。

中国史就这样作为下位组成部分，编入了西欧中心观的世界史中。当然，日本史也被配置在世界史叙事

¹¹ 尹相侑,上面论文,第91页

¹² 尹相侑,上面论文,,140~144页

¹³ 金龙德,《国史的基本性质-以我社会的身份为中心》,《思想界》1953年9月号,第53页。

¹⁴ 金容燮,《走在历史的小路上-解放一代学者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讲义》,知识产业社,2011,第98页。

¹⁵ 郑文相,《中共,自由中国和中国-冷战时期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惠安,2019年。

¹⁶ 全海终·闵斗基,《日本史》,1964年。。

¹⁷ 藤井武司,《第一共和国的统治理念——反共主义及其变形》,《历史批评》83,2008年,第140~142页。

¹⁸ 教育课程·教科书研究会编,《韩国教育课程的变迁—中学》,大韩教科书股份公司,1990年,第96~97页。

¹⁹ 南韩鎬,《第一次教育课程世界史叙述体制与内容分析》,《历史与教育》22,2016,第143至145页。

的次要位置。第一次教育课程的世界史框架中与日本史相关的内容如下：

亚洲势力的扩张与欧洲社会的形成

- (1) 伊斯兰世界是怎样形成的？
- (2) 唐宋时代情形是怎样的？
- (3) 蒙古和日本是怎样发展的？

5. 近代东洋的情形是怎样的？

- (1)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怎样的？
- (2) 西南亚洲的变动是怎样的？
- (3) 西方力量是怎样侵入亚洲的？
- (4) 近代日本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 (5) 东洋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高中阶段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尽管日本史的篇幅相比初中阶段有所增加，但在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中，也就是作为中国史的下位范畴简单交代了时代概况而已。²⁰

尽管如此，这种自由主义为反抗李承晚总统的威权主义、进而引发“4. 19革命”，提供了某种思想资源。但由于它植根于东洋落后性论，终究未能很好地回应韩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再度成焦点的去殖民问题。

与此同时，在韩国史学界内部，殖民史观问题正式被纳入议程。过去对韩国历史的解释多被日本学者的殖民史观所扭曲，基于这种认识，1958年底在李承晚总统的指示下，国史编纂委员会盘点了国史存在的诸多问题，编辑出版了第1至第6辑特刊。²¹ 执笔人分别是：古代（檀君朝鲜-新罗）李弘植，中世纪（高丽时代）金庠基，近现代初期（朝鲜太祖-宣祖）申锡镐，近现代后期（光海君-哲宗）李丙焄，近现代高宗-8·15解放）李瑄根。这是首次涉及殖民史观问题的一系列特辑丛刊。然而考虑到这一时期是，面临1960年总统选举的李承晚政府为了限制在野党言论而于1958年11月修订的国家保安法在国会审议期间，李承晚总统提出的殖民史观问题很可能是为吸引眼球摆脱危机故作姿态的政治修辞。为在野党发声的《京乡新闻》在1958年1

²⁰ 李海南，《高中社会科世界史》，1959年，探究堂；金成根，《高中世界史》，教育社，1961年。

²¹ 国史编纂委员会编，《国史上的诸问题》1，1959年，第1至2页。

2月21日社论中呼吁抵制新国家保安法：“我们要像那些在倭政殖民政策下为了恢复民族的自由而舍身成仁的爱国之士那般斗争起来”²²。在1950年代，李承晚总统的倡议终究没能产出相应的研究成果，止步于政治标语。而在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前后，这个问题又重浮出水面引起了关注。

4. 韩日关系的新探索和韩国史体系化的问题：1965年至1981年

1965年的韩日邦交正常化对韩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的军事政府迫切希望获得美国支持，以便引进经济开发所需资金和技术。而美国这一时期制定了针对北方社会主义阵营打造亲美反共防波堤的东北亚区域统合战略，欲构建强有力的“美日韩三角安保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韩国有一个强力的反共政府，韩日邦交正常化无疑是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美国的这一东北亚政策，提升了日本在本地区的地位，日本也刚好能通过韩日邦交正常化消化掉通过朝鲜战争特需赚取的过剩资本。而韩国军事政府则如愿赢得美国的支持，抓住了引进经济发展资金和技术的绝好机会。而军事政权的对日政策显然对学界产生了影响。

正因如此，美国对第三世界外交政策背后的洛斯托（Rostow）的现代化理论对韩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²³但是在韩日会谈前后，以历史学界为首，韩国的有识之士对日本的再崛起并没有放松警惕。1965年7月9日，韩国史学会代表干事带头发表了反对韩日会谈的声明。紧随其后，多个历史相关的学会发声明敦促政府废弃韩日协定。他们斩钉截铁抨击道：韩日协定不是基于平等互惠原则之上的条约。²⁴结果让韩国人提高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韩国文学和国史学的独立性也备受关注。当时，以西方史为主的世界文化史已经入主大学的公共必修课，与此相对的，培养韩国史研究人才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

特别是在历史教育现场，根据第二次课程改革将韩国史和世界史合并授课的做法引起了不小的抵触和不满。²⁵因为按统合社会的原则，不仅要国史和世界史整合到社会课中，还要大幅削减世界史的内容。尤其在形式上，要将西方为主的世界史插进韩国史中，中国史更不用说，日本史也难免被忽视。例如，“前近代世界的生活”总共60页，中国和日本只占了6页。²⁶其中内容包括明朝的兴亡、明朝的文化、清朝的统一观的演进、清朝的文化、印度国内的对立、日本的幕府政治、日本的明治维新等。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相继提出：韩国的主流史学依旧是受殖民史观支配的那套体系。²⁷为此，1967年1

²² 《社论：在这片土地上实现“心中的祖国”》，《京乡新闻》1958年12月21日。

²³ 朴泰均，《洛斯托思第三世界现代化论与韩国》，《历史评论》第66期，2004年，第156159页；Michael E. Latham，权赫恩等，《现代化作为意识形态》，Greenbee，2021年，第9597页。

²⁴ 《历史研究、历史学会反对批准韩国历史学会宣言》，《东亚日报》1965年7月10日。

²⁵ 康宇哲等，《本刊座谈：修订的教育课程与历史教育存在的基本问题》，《历史教育》第9期，1966年，第167~169页。

²⁶ 朴成峰等，《新社会》，洪志社，1970年。

²⁷ 金哲垵，《国史教科书需要改变》，《新韩报》，1968年11月11日。

2月韩国史研究会宣告成立。其成立宣言开宗明义：“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韩国史，进一步推动其发展，以便建构正确的韩国史体系，使韩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占据应有的位置。”²⁸ 随后，于1969年12月，李基白、李佑成、韩祐勋、金容燮向文教部提交了关于初高中国史教育改革基本方向的研究报告，力主改进国史教育。²⁹ 这表明韩国史不再是世界史的附属范畴，将作为独立领域自此展开自我探索。于是，以西方史为中心、中国史为副中心的世界史和自成一体的韩国史形成了历史教育的两大核心。韩国史曾经是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轴线，但到了1968年12月颁布的《国民教育宪章》和1972年10月维新体制启动前后，竟打出树立民族主体性的旗号，逐渐发生蜕变。韩国史从社会科目中独立出来，但世界史仍然编入到社会科目内；韩国史引起了当权者的“强制性重视”，韩国史与世界史的间隙拉开了。³⁰ 两者衔接互动的余地越来越小了。

在这个过程中，以东洋史研究者为中心，学者们纷纷发声抨击。在韩日邦交即将正常化之际，全海宗指出人们对日本史的无知和认知的碎片化，1964年与闵斗基合著了《日本史》一书。这是首部由韩国人撰写的日本通史。全海宗表明出版动机如下：

自古以来，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受大陆文化。在与日本的关系中，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无疑是壬辰倭乱和日本在韩日合邦后推行的殖民政策。如今，我们不得不将痛苦的过去留在过去，把日本视为相邻的友邦，与之建立崭新关系。

当自问对如此重要的日本历史究竟了解多少时，我很难回答我自己有高出常识的认知。解放以后20年岁月流逝，至今却没有出版过一本日本史的书，我们史学界应当为此感到羞愧。撰写历史书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出于想了解日本史的意愿，我们编写了这本书。

最近，由于韩日邦交问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日本。我们希望读者从历史的角度把握日本方方面面的样貌，形成正确的日本观。³¹

正值韩日邦交正常化，克服殖民史观的呼声高涨，编者大力强调了解邻国日本的历史的必要性。关于时代划分，本书由“古代日本”、“中世日本”、“近世日本”、“近代日本”和“现代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算起）组成。这是基于日本内在发展过程进行划分的。

全海宗进而批评过度强调“主体性”和“民族性”的做法，主张不应拘泥于东洋史与韩国史的关联，强调东洋史也应自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³² 另外，闵斗基提出的主张是：东洋社会（比如中国）的近代化，并非是受西欧冲击被动裹挟而致使传统断裂的西化，而是士人阶层对抗西方的冲击、立足传统自主革新的

²⁸ 韩国史研究会网站<https://www.hanguksa.org/front/introduce/history/view?id=102&page=3>。

²⁹ 李基白·李佑成·韩祐勋·金容燮，「改进初·高中国史教育的基本方向」，1969年，文教部研究报告，第4页。

³⁰ 金泰雄，《国史教育的编制和韩国近代史探究》，先人，2014年，第23~25页。

³¹ 全海宗·闵斗基，《日本史》，知文閣，1964年，第1页。

³² 全海宗，《东洋史教育的问题与方向》，《历史教育》第14期，1971年。

自生发展。³³黄元九则强调：响应国家政策，反映民族情绪的东洋史学不可取，作为历史学家能不带偏见地看待日本和中国的主体性才是可贵的。然而，许多学者对西化并非传统的断裂而是某种自生发展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³⁴

于是，维新体制下的历史叙事主要由国史和世界史构成，世界史则都是以西方史为中心、中国史为副中心的固定模式。尤其是韩国史，与总体目标要求“了解韩国民族自身发展史”、“通过建立全球维度的认知，把握民族史的特征”不同，年级目标和单元目标唯一强调的是一种能克服国难的民族精神。于是与中国史、日本史仅仅是通过战争这一媒介得以关联起来。³⁵

5. 韩日历史纠纷与民主化运动的联动：1982年至2001年

历史叙事的二元结构，到了1982年韩日间发生历史纠纷时迎来了新局面。1986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了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议结果，其中与朝鲜半岛和中国有关的“侵略”词条被改成“进入”（日文为“进出”）、“3·1运动”被改为“暴动”等，除了这些用词有所修改之外，“3·1运动”造成7000名韩国人死亡这一细节也被删除。日本媒体报道了以上内容。

但是，通过镇压“5·18”民主化运动掌权的韩国新军部为了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从日本吸引大规模投资，不许媒体报道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消息。最大目的就是为引进日本政府贷款。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通报新军部政权：日本不能为其提供“安保经济合作贷款”，于是事态便急转直下。新军部政权利用民众的反日情绪作为导火索，全面点爆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7月下旬起，韩国和中国媒体不约而同炮轰日本篡改历史的行为。而日本政府则不以为然，认为历史教科书审议过程是客观公正的，审议结果不会损害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国土厅长官甚至称这些指摘是“干涉内政”，事态进一步恶化了。

还好，适逢新冷战打响，美国判断韩日之间这种冲突对其东亚政策势必带来负面影响，在里根政府撮合下，日本政府与韩国新军部政权秘密达成共识，承诺向韩国提供40亿美元贷款，这个问题在次年1月中曾根首相访问韩国期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³⁶ 中曾根首相在正式访韩期间举行的青瓦台晚宴致辞（1983年1月11日）中表示：在韩日两国之间的确存在过不幸的历史，我们必须严肃地接受这个事实。进而1984年9月全斗焕总统访问日本时，中曾根总理在午宴致辞中谈到：20世纪，有一段时期，日本给韩国和韩国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我对此深感遗憾，在此坚决表明将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此，新军部政权算是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³³ 閔斗基，《两个中国论-历史背景和问题的焦点》，《世代》第4-7期，1966年7月。金衡钟，《故閔斗基先生的学术业绩》，《东洋史学研究》第74期，2001年。郑文相，《在‘中共’和‘中国’之间-通过1950~1970年代大众媒体上的对华关系论述看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东北亚历史论丛》第33期，2011年，第70页。

³⁴ 《没有底边的东洋史研究“反省与课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京乡新闻》1970年3月31日。

³⁵ 车美姬，《韩国初中高中国史教育-以国史科目独立时期（1974年至1894年）为中心》，教育科学社，2011年，第50-52页。

³⁶ 曹世亨，《韩日关系50年，冲突与合作踪迹》，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2014年，第107-108页。

与中国不同，新军部政权就这样将“反日”的旗帜换成了“克日”的大旗，独立纪念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成的。新军部利用歪曲事实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和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强化了政权的根基。而日本政府在1982年11月出台的教科书审议标准中追加了一项条款：“内容涉及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时，必须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的角度加以必要的考量。”³⁷

新军部政权达到自身目的后，立即以组织反国家团伙罪构陷了带头举办日本历史教科书批判讨论会的学生们。³⁸ 新军部政权是想借机一举消除质疑政权合法性的学运势力。然而，上面达成的共识不过是权宜之计，韩日之间历史冲突随时都有重燃的可能。当时韩国社会处于新军部政权高压统治下，程序民主化还远没实现，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宣泄。不过这倒成了日后在韩日之间出现试图克服历史认知差异的尝试的契机。

特别是1988年诞生的卢泰愚政权与此前的全斗焕政府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尽管卢泰愚政权的根基也是新军部势力，但毕竟是在1987年6月的民主化运动后通过修宪进行直接选举掌权的，因此卢政府不得不向程序民主转轨。再加上冷战终结也对韩日关系的重建起了助推作用。

由此，1980年代持续被提起的日军“慰安妇”问题逐渐进入韩国公共领域的讨论，而就在1990年6月，日本政府宣布“日军并没有参与军队慰安妇问题”；1991年8月，金学顺（1924-1997）通过报纸和媒体而非女性杂志揭露了日军“慰安妇”真相，将此议题从私人话题提升至公共记忆的高度。这样的控诉，只有在韩国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达到相当高水准并且人权意识也大幅提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对此，日本政府通过1993年河野洋平外长的声明，承认了日军在“慰安妇”的征集、配置、移送和管理等环节直接或间接参与的事实。随后，金泳三政府明确表示：日本应将日军“慰安妇”的悲惨遭遇写进教科书中，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在这种氛围下，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从1997年起对日军“慰安妇”相关内容进行了记录，哪怕只有一两句也均有所涉及。

不用说，日本的保守右派势力猛烈攻击日军“慰安妇”相关记述。《新历史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成了可能重新点燃韩日历史冲突的火种。尽管如此，2001年10月15日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终究还是达成了共识：作为应对历史冲突的一种方案成立“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并开始运作。这时正值2002年韩日联手举办足球世界杯前夕。

6. 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路程和《东亚史》的诞生：2002年至今

1998年金泳三政府谢幕，金大中总统上台。此后，南北关系改善了，韩日关系也迎来了新局面。1998年，金大中总统和小渊惠三相联合发表“金大中-小渊宣言”即“21世纪新型韩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宣言”，该宣言被誉为推动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两国关系更上层楼的重要文件。小渊首相承认了日本殖民

³⁷ 郑载正，《韩日历史冲突与历史对话》，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2014年，第49页。

³⁸ 徐京锡，《回顾1982年日本教科书四科目公开讨论会》，《历史系60年史》（首尔大学师范大学历史系编），2007年。

统治曾给韩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对此表示“痛切反省，发自内心的道歉”。这是韩日外交史上首次将日本对过往历史的反省和道歉明文写入达成共识的正式文件中。根据这一宣言，韩国政府向日本大众文化敞开国门。进口日本电影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了配合这种和解气氛，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广泛收集能够认识双方的差异、达成相互理解的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论不再停留在如何客观把握本国史的层面，而是上升到了将韩国、中国和日本所在的东亚的历史作为中间媒介，把本国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审思的水准。因此甚至有学者展望：如果中国和日本也能朝着这个方向迈进的话，三国可分享的内容范围将变得更广阔。如何重构历史叙事的问题全面推到议程上。这种努力的成果就是2005年诞生的韩中日共同编纂的东亚近现代史。这是韩中日三国共同策划、执笔撰写，并且在各国同时出版的首部东亚共同历史教材。反对日本教科书篡改历史的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教师、社会活动家等，花费了4年的时间，面对面细致推敲每一个用词和句子写就的这本东亚近现代史，深刻反思被侵略和战争血泪浸染的19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表达了对东亚享有和平、人权、民主的美好未来的追求。该书的特点是：力图摆脱偏狭的国粹主义，围绕20世纪侵略与反侵略史，谋求东亚共通认知的形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涉及到1930年代日本在东亚所发动战争的有关章节，将题目定为“日本民众的加害与受害”、“日本的侵略战争告失败”等，并且一以贯之从这个立场叙述历史。该书最后一章“为了东亚的和平未来”也值得瞩目。这一章直面历史，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各国清算过往历史的问题、日军“慰安妇”问题、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以及历史教科书歪曲事实的问题等。

另一方面，2003年中国展开的“东北工程”（译者注：把曾经存在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国家的历史纳入中国史进行考察的大型学术项目，于2002年2月正式启动，为期5年）在韩国引起广泛争议。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并没有停止该学术项目，反而快马加鞭地向大众推广其研究成果。³⁹ 鉴于此，韩国政府于2004年3月成立了高句丽研究财团。

这一系列的冲突纠纷超出韩日、韩中关系的范围，最终影响到了整个东亚。韩国和日本的非政府团体等立足于本国中心的民族主义观点，强调起和平与共存这一普世价值，讨论的外延随之扩大了。其结果就是，以歪曲历史著称的日本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采用率显著下降，在韩国方面则是新设的东亚史课成为教育课程改革的热门议题。⁴⁰

进而到了卢武铉政府时期，“东北亚均衡者”新构想出笼。该构想提出：要以东北亚为中心，建设“和平繁荣共同体”，韩国成为引领者，在这个动荡和不透明的地区，化冲突为和解、化对立为合作，强调在此过程韩国应积极发挥能动性。这个新思路与超国家主义的东亚话语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局面。⁴¹

此外，学术界在东亚史叙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1990年代的后冷战和后现代主

³⁹ 东北亚历史基金会，《超越冲突走向和解》，2006，34~39页。

⁴⁰ 智模善，《〈东亚史〉科目的设立和教育课程发展》，《历史教育》，128，2013，72~73页。

⁴¹ 韩国东北亚知识人连带编，《朝着东北亚共同体》，东亚日报社，2004。

义登场之际，区域史作为一种既能够超越国家和民族，又能客观地看待并反思欧洲中心的世界史的方法论和范畴引起了关注。人们开始形成东亚史是介于本国史和世界史之间中间态的历史思考体系的判断，认为应能将二者紧密相连起来并实现互动。⁴²

学术界的这些进步，是因韩国社会正式进入程序民主化阶段，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达到相当水平才得以实现的。尤其与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时期不同的是，现已完成足以克服殖民史观的研究人才储备，因而可以回应中日扭曲历史的做法了。换句话说，民主化、经济实力和研究成果是催生东亚史教科书的主要因素。于是在2007年的课程改革中，高中首次引入了《东亚史》这门课。这表明经过第一次课程改革时期，将历史课分为韩国史和世界史的二分论被解构，现在重新回归三分论。然而，这种三分论有别于解放政局下坚持的三分论。亦即后者分为未能摆脱既往殖民史观的韩国史、欧洲中心的西洋史、中国中心的东洋史；而前者则是由已经摆脱殖民史观的韩国史、以交流与贸易为中心的世界史、强化东亚三国间关联的东亚史构成。因此《东亚史》课的教育目标定为：“了解历史上在东亚地区展开的人类活动及其留存的文化遗产，加深对东亚地区的理解，涵养追求地区和平与共同发展的视野及态度”。尤其是把重点放在了从史前时代到现代东亚人所建立的文化共通性与关联性探索上，以便培养学生积极能动地参与维护东亚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活动的素质。当然，上述架构的世界历史课和东亚史课所追求的目标，与教学实践之间仍存在较大反差，因此招致了不少严厉批评。⁴³

即便如此，韩国的《东亚史》教科书出版前后，韩国国内自不用说，中国 and 日本的学术界和历史教育一线也相继出现按照这种区域史方法论撰写的东亚史·韩日关系史的概论书和教材。我们可以预想，这6种努力必将成为韩中日三国在历史叙事构架上持续而有意义的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

7. 结语

目前，在新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击下，韩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随市场需求呈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科目设置也随之变化不定，《东亚史》教科书的命运可说是前途未卜。最要命的是，《东亚史》与《世界史》一道被公认为韩国的高考科目中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得分最低的科目，因而没多少学生选修这门课。这显然给韩中日三国的未来投下了阴影。如果不能确保并且维持能持久推动相互理解的制度机制，那么，跨越矛盾走向和解的希望就会十分渺茫。尤其是在无法指望通过国家之间对话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政治不但没能扩展相互理解的范围，反而使空间变得更狭小，当今的这种局面令人担忧。因此，为了做到不被政治热潮裹挟而带着主体意识阐释现代世界和已然全球化的世界、并去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有必要通过学术界与学术界、教

⁴² 白永瑞，《本国史与区域史的互通：东亚人的历史叙述倾向》，《历史学报》，196，2007，105-106页；柳鏞泰，《以东亚史为视角》，首尔大学出版文化院，2017，68-76页。

⁴³ 梁豪焕，《世界史教育：变革话语与教科书叙述的现实》，《历史教育》，140，2016；柳鏞泰，《东亚史与世界史，为了什么教什么？—探询‘农业缺席’的交流史》，《历史教育》，164，2022。

育现场与教育现场、民间团体与民间团体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分享，将重构历史叙事的事业持续坚持和发展下去。因为唯有这种努力才能为新一轮对话奠定基石。⁴⁴

■ 金 泰雄 (KIM, Taewoong)

1984年毕业于首尔大学师范大学历史教育专业。1990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国史学科硕士，1997年毕业于首尔大学研究生院国史学科博士课程。文学博士。现任首尔大学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系教授。专业领域是韩国近代史、韩国社会经济史。

代表著作：《根深蒂固的韩国史》，《深泉般的故事6（近代篇）》sol_book（出版社），2003。《韩国近代地方财政研究》Acanet（出版社），2012。《大韩帝国与3.1运动》Humanist books（出版社），2022。

⁴⁴ 近藤孝弘，朴京熙译，《历史教科书的对话》，历史批评社，2006，7~11页。